

建卫618年,几代人的记忆拼图

我和我的天津

1404年12月23日(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),“天津”正式得名,筑城设卫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618年历史积淀,天津人的性格一脉相承。从原住民到外来者,从名人学者到普通百姓,人人都有一段精彩人生。他们的故事看似互不相干,却也因为同在一座城市,而紧紧融合在一起,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又生机勃勃的天津图景。

冯骥才 这个城市的我都有感觉

冯骥才,1942年出生,著名作家、学者。

我年轻时跟溥佐先生学画,在天津篮球队打过一年多篮球,后来在塑料厂当工人,干推销员。我骑着自行车在天津城里跑,天津城的一切我都熟悉。我到工厂去跑业务,坐那儿跟人家喝茶、抽烟、聊天。所以我能写《俗世奇人》,我能写《神鞭》,就是因为天津人的故事我知道得太多了,我对天津人的性格太了解了。

我喜欢天津人的性格。天津人的豪爽,天津人的厚道,天津人的强亮,天津人的戏谑,天津人的好面子,逞能,包括天津人的缺点我都喜欢。喜欢一个人,如果连缺点都喜欢,才是真的喜欢。就像夫妻,长期生活在一起,对方什么缺点都不以为然了。我太热爱这个城市了,太熟悉这个城市了,天津的生活到了我的书里,跟我的生命融为一个整体,天津好的东西我一直以它为荣。

1992年、1993年前后,第二次改革浪潮之后,带来全国城市的变化。那时候我还在写小说,忽然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变了,到处都是“拆”字。那个时代人们渴望城市改变,渴望旧貌换新颜,突然感到自己脚下的传统松动,情不自禁地想要保护天津老城。我组织一大批摄影家拍摄老城,请了一批建筑学家、历史学者来讨论,在各个地方演讲,呼吁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城市。

世界上主城区是文化遗产的,像伦敦、萨尔斯堡、维也纳、布拉格,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的主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。我在脑子里划了划,五大道,从小白楼过去,把解放北路圈起来,不能大修大建,就是整理好,可以找一批专家一块儿研究,申报世界文化遗产。如果天津有世界文化遗产,旅游价值和知名度都会提升。租界是天津的历史,是人类的历史,是这个城市的特征,恰恰也是别的城市没有的,所以没有问题。

孟广禄 小时候在海河边学唱戏

孟广禄,1962年出生,著名京剧艺术家。

小时候我家住河东区郭庄子。电台总编播板戏,我从小爱听。我大姐单位开联欢会,她带我去。我上台就唱,胆子特别大。长大点儿以后我总去海河边广场,那儿的戏迷特多,我找一个老大爷,说您给我唱一段儿《赤桑镇》吧。他唱,我跟他学。回家后我自己练。我的京剧启蒙老师是名票友陶汉祥先生。他是第一个给我说戏的人,他把自己家的录音机借给我,让我能更方便地听戏、学戏。

1977年夏天,我去考天津戏校。那天天下大雨,马路上全是积水,因为害怕踏水激着,着凉嗓子坏了,我哥哥就推着自行车,我坐在后衣架上,把脚抬起来,盘着车前面的大梁。到戏校以后,我哥哥帮我扎好板带,我上去唱。结果落榜了。

1978年,中国戏曲学校招生,全国要十个人,天津要一个人。我又去考试。过了一段时间,有一天我正在房顶上放风筝,邮递员送信来了,有两封孟广禄的信。都是录取通知书,一封是我考上飞行员了,一封是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。我爸说,当飞行员得去沈阳,离家更远了,还是去北京吧。从这一起,我开始正式学戏。

杨少华 走到哪儿都树人缘

杨少华,1932年出生,著名相声演员。

我生在北京,小时候常溜进常连安掌穴的启明茶社听相声。想干这行,自己找辙,进了旁边的明园茶社做杂工、干场活。常宝霆比我大三岁,是他给我开的蒙,教我说《六口人》《反七口》。19岁时我来天津,进钢厂当钳工。常家也落户天津,我又和常宝霆这拨说相声的凑一块儿了。

我干这行,如果贪图小便宜的话,就走不到今天了。说句良心话,老一伙儿说相声的,都花过杨少华的钱。“嘛钱不钱的,乐和乐和得了!”这句话是杨议说的。这句话很有分量。你有金山,到最后不也带不走吗?我比较随意,乐和乐和得了,但好像杨议不这样想。他买了好多古玩,我说你买这些干嘛?他说,您不知道?我给社会做贡献。杨议一直说,“杨光”最大的法宝就是相声,用的都是相声理论,台词是相声的台词,它也许不是相声的包袱,但逻辑上是相声的思维。他这个思维,给天津的相声,甚至于给天津的平民老百姓留下了一条根儿。

耿福林 利顺德的金牌主厨

耿福林,1936年出生,曾获国际美食金奖。

1956年,我20岁,从河北区饮食公司调到利顺德,跟老师傅学厨艺。那时候利顺德的正门在解放北路,外檐的木头柱子是紫红色的,特别漂亮。英国人刚刚把利顺德移交中国政府,归属于天津市交际处,专门负责接待外宾,改名“天津大饭店”。

1993年,国际酒店委员会俱乐部的评委来中国考察,评选“世界名厨”。前两站是广州白天鹅宾馆、上海锦江饭店,第三站是利顺德。我代表利顺德参加评比,准备了八冷八热,每个菜的味道、颜色、造型都不一样。有一道番茄虾球,用苦瓜雕刻了几艘小船,做成器皿,用胡萝卜刻了划桨的老头,摆在船尾。每艘小船上放四个用番茄酱炒过的虾丸。还有一道菜叫五彩牛柳,把橙子的顶部切去,挖空,炒好的牛柳盛在里面,橙子皮被热菜一烫,香味四溢。宴会吃到一半,评委会主席就对大家说:“今天这四桌不但好吃,而且好看,是一种艺术享受,不用再评了,金牌就应该给利顺德!”

蒋子龙 抒写波澜壮阔的工业时代

蒋子龙,1941年出生,著名作家。

我生在沧州,1960年从天津重型机器厂技校毕业分配进厂。“天重”是全国“五大重机厂”之一,曾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标志。我上学时喜欢读书、写作,工作中感受到“天重”波澜壮阔的辉煌,感觉自己的创作冲动被激发了出来。那几年我白忙工作,晚上通宵开夜车,完成了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《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》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《锅碗瓢盆交响曲》等小说。

1979年,《乔厂长上任记》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,“乔厂长”成为改革者的代名词,各地涌现出很多“乔厂长”。《文汇报》的大标题“欢迎乔厂长上任”,不是小说,是专门写那个工厂的通讯,因为那个厂子的厂长被工人们称为“乔厂长”。天津市经委请上海的企业家来做报告,一个老朋友拿着票来找我,票上写着“上海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”,他说:“蒋子龙同志你说,他怎么是乔厂长?乔厂长是天津的啊!”

我还有两部书得写,一部写我的家族,另一部回归工业题材,写关于天津工业的历史小说。我研究过侯德榜、范旭东,他们讨论的问题都具有国际视野,他们对化工行业了然于心,造出来的产品都是顶级,都能拿到国际大奖。那是什么高度、什么境界?我写现代工业题材,理所当然应该写到天津工业的根儿——百年前的民族工业,能源、造船、造枪、纺织、化工……完成这本书,我这个工业题材作家才算圆满。这也是一种责任。

天下霸唱 “大耍儿”如同“大侠”

天下霸唱,1978年出生,著名畅销书作家。

我在天津老城里的胡同长大,天津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,有独特的民俗,对我影响颇深。我特别喜欢听评书,也听过不少“野书”,很多奇案、奇事被说书先生们编撰成书,在路边给大伙儿讲,靠此谋生。我的《河神》《火神》《崔老道捉妖》《窦占龙憋气》等作品,都与老天津卫密不可分,故事的线索大多来自民间。

《大耍儿》是我第一次写关于天津的故事,时间定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。写这部书时,我常想起自己生活过的地方——老城里,那里街道颠簸不平,胡同七拐八绕,大杂院里堆满各式杂物,墙上贴着黑乎乎的黑报纸,各家屋顶上都插着鱼骨一般的电视天线,鸽子飞过去时,响起阵阵哨声……数不清的老街旧巷,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孔,随着老城被推平各奔他方。我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。从我内心来说,天津的大耍儿接近于武侠小说中的大侠——好脸儿好面儿,不欺软不怕硬,乐于助人,尊老爱幼。造型必须得到位,一顶羊剪绒帽子,一身将校呢制服,一件将校呢大衣,在当年难免让人觉得咄咄逼人,但人家讲的是规矩,闯的是人物字号,绝不胡作非为。这也是老天津延续下来的处世方式,不仅为大耍儿定了型,也潜移默化影响了许多老天津人。

张云雷 我的根儿在天津

张云雷,1992年出生,德云社相声演员。

我生在红桥区,因为打小后脑勺留着一个“小尾巴”,所以小名和外号都叫“小辫儿”。记得小时候,我爸开了一辆白色吉普车,车里每天都放邓丽君的歌,我一上车就听到《小城故事》。我也喜欢唱,无论唱歌还是唱戏,打小就不走调。《青藏高原》的高音随便就能唱上去。吃过午饭,表姐王惠要去演出,就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到“长寿园”剧场。我有时在前台,有时在后台,坐在小板凳上从头听到尾。时间久了,整段的京韵大鼓《宝玉探晴雯》都能唱下来了。2000年,我8岁,表姐把我带到北京,一边上学一边跟郭德纲老师学太平歌词、莲花落。2005年,我倒仓了,高音上不去,没自信了,只身回到天津。我在台球厅帮人摆球,当过餐馆服务员,当过电信客服,天天接电话。但心里还是惦记着相声,放不下,一个人偷偷回北京。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,忍住了没去找师父,四处打工。表姐找到我,硬把我接回家。我师父根据我擅长唱的特点,教了我不少以唱为主的段子。我和郭麒麟两个人,每天起床后收拾东西去小剧场,晚上演出完,找个地方吃点儿夜宵,然后回家。那段日子特别开心。

捞面大姨 找回小时候的滋味

汪金雯,“60后”,自1995年起开办“大姨捞面”面馆。

以前我们家住在广开四马路。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,小孩儿到点儿就饿,用牙刷抹上圆铁盒里的“牙净”刷牙漱口,洗完脸抹上蛤蚧油,桌上有我爸留的一毛钱,掀开馒头筐,拿个凉馒头去吃早点。穿过六吉里就是二纬路,那有卖面茶的,是用大铁锅熬的糜子面面茶。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,不稀不稠,撒了双料芝麻酱、淋上麻酱,5分钱一两粮票一碗。我喜欢吃凉馒头就这个面茶,有富余钱时,再来一根热棒槌粽子。

广开那四块儿有六合街,十字路口是一个大食堂。推开门,一股啤酒香扑面而来!大铁桶里有一个压把儿,啤酒就是从那儿出来的,用大玻璃杯接着,一扎一扎的。我爸买一扎啤酒,倒进自己的大茶缸子,再打一小盒素面汤,买几个花卷,要一个炒肝尖儿,带回家。

我从一个单纯爱吃的人变成从业者,开了家捞面馆,可能也是一种缘分。1995年创业第一天,20斤面条不到一小时就卖光了。慢慢有了点儿小名气,被天津电视台聘为美食嘉宾。我希望吃过的人都能记得“大姨捞面”,就像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吃过的那些好吃的。

骆巍巍 奶奶骆玉笙是超级美食家

骆巍巍,1965年出生,金嗓鼓王骆玉笙的孙女。

上世纪70年代,我在新华南路小学上学时,我们家被退赔了一批财产,折成现金。不少亲朋好友来借钱,奶奶能借就借。剩下的钱,我爷爷说,咱都吃了吧。从那时起,我们全家每周日都去下馆子。

奶奶爱去辽宁路上的天津烤鸭。有时她中午想吃烤鸭,就带着我坐9路公交车,到和平路终点站下车,直奔烤鸭店,因为去晚了要等座。点三两烤鸭,一份芙蓉鸡片,一份烧二冬,一碗米饭。吃饱了结账,结账时还得用粮票,一碗米饭要一两粮票。她也爱吃海参、虾仁。但虾仁不总有,为了吃清炒虾仁,还特意去国民饭店的餐厅找熟人预订。起士林也是必去的。每个月至少去一次,在楼上吃正餐。当时起士林还是老师傅主厨,奶油烤鱼归和肝泥、俄式土豆沙拉是我的最爱。不是因为那时肚子里没油水才觉得好吃,是真的好吃。

别看奶奶吃得特别精致,但生活条件差的时候,她也能适应。她吃饭最多八分饱,多好的菜,也从不暴饮暴食。良好的身体条件,保证了她在舞台上的表演水平。她说:“我年轻的时候穿过、戴过,什么都见过。到现在这把年纪都无所谓了,但只要一样,一定要吃好。吃好了身体才能好,身体好了才能干好工作。”

许丽丽 流行歌手回归传统文化

许丽丽,1964年出生,第二届青歌赛冠军。

1986年4月27日晚上,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决赛出现戏剧性的一幕——我和谢青在得分相同的情况下加赛一曲,我又唱了一遍《春光美》,最终以9.38分获得第一名。天津市为获奖歌手召开庆贺会,市长李瑞环讲话:“要把天津市的文艺活动搞得更加活跃,让全市人民工作得紧张愉快,生活得丰富多彩。”我成为天津市歌舞团的专业演员,剧院奖励我一套单元房、一台彩电。也得到音乐界的肯定,加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。天津音像公司为我录了《牛虎》《牛豹》三人录制的《牛虎豹》专辑,磁带销售百万盘,创下当时最高发行纪录。

那些年经历过一些风浪,后来生活和心态趋于平和。我父母喜欢曲艺,我也开始学鼓曲。著名梅花大鼓艺术家籍薇老师教我唱《丑末寅初》,这是个二番唱段,第二段长腔最难,每个字的发音,从字头到字尾都有讲究。我练了足足三个月,终于拿下了这段鼓曲,在“天津相声”上登场演唱。

当初我在畅观楼当服务员,溥佐、张洪千、慕凌飞、启功等书画大家常来饮酒绘画、谈艺论道。我接触到绘画,随溥佐之子毓震峰学画,还认识了一起学画的顾砚。顾砚是爱新觉罗宗室后人,受家族影响学画苦练,绘画造诣不断提升,成为非遗项目“津派宫廷画技法”传承人。我俩因共同爱好重逢,经常一起交流心得,提升画技,慢慢走到一起,结为百年之好。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,我对人生有了新感悟——无论做什么事,都要踏踏实实,不能浮皮潦草,这才是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。

李德林 路边吉他队大队长

李德林,1956年出生,上世纪80年代天津红歌星。

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,我们都住进了临建棚,晚上在路边玩吉他。后来房子修好了搬回去,玩吉他的习惯保留下来。我跟着收音机短波频率和录音带学了不少邓丽君、刘文正的歌,自己录了两盘磁带。磁带流传出去,我从很多地方都听到有人用录音机放我弹唱的歌。

王朔的小说里写北京顽主“茬琴”,我们也茬琴,但天津不叫茬琴,叫“会琴”。我们去王串场会琴,对方熬一锅绿豆汤,坐在路灯底下开唱。两拨人你一首我一首歌唱,聊了没聊,就算聊。有人因为会琴打架,我却因为会琴交了很多朋友。慢慢地大家都知道李德林了,一般人不敢再跟我会琴,路边吉他队大队长这个外号叫响了。1985年,天津市举办业余歌手大赛,我拿了第一名。随后在人民体育馆演出,报幕员报我名字,台下观众鼓掌叫好。我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儿名气了。

很多人说我现在唱歌比年轻时好听,我觉得可能是年龄大了,声音没那么变,但是有底蕴、有沉淀,不像过去去追求唱高音。见过我的朋友都说,你可不老。我觉得,可能是因为唱歌是锻炼心脏最好的方法吧。

卞学芹 乡村下家在天津赓续三百年

卞学芹,1942年出生,清末乡祠下家后人。

天津卞氏家族起源于山东泗水。1715年,卞大瑛以文人之身为幕僚北上天津,娶妻子开枝散叶。卞氏子孙定居津门,至北迁四代“礼”字辈开始经商。1803年开设“隆顺号”经营土产杂货,几代人精诚团结,跻身津埠富家之列,但书香门风始终未断。卞树榕熟读医书精通方药,为族人治病药到病除。1833年他在针市街开设药店,以自家生药“隆顺号”和他本人名字中的“榕”字结合而成“隆顺药庄”。

我出生在香道街175号,现为睦南道79号,81号至87号是我四伯家。我们两支同时买地比邻而居,建造了不同风格的府邸。因祖父早逝,祖母是杨柳青名翰林刘学谦的胞妹,受书香熏陶,治家严谨,教子有方,三个孩子在学业、事业上都有成就。全家二十多口住在座座四合院里,生活并非奢侈腐化,相反,仍秉承了勤俭持家的家风。我细读家谱及有关资料,加以艺术渲染,创作、出版了长篇小说《临水朱门》,通过几家宅门故事,展现当年天津的民俗轶事和社会风貌。

马小川 爷爷马三立一辈子都在琢磨包袱

马小川,1981年出生,马三立之孙。

爷爷对每次演出都特别重视。演出前,他会花很长时间思考表演哪个段子。因为他知道,之前的段子观众都太熟悉了。说老话,观众肯定也会鼓掌,但那不是他想要的;说新活,总觉得包袱琢磨得还不够,现场未必能火,观众未必会乐。就因为这个,爷爷推掉了演出,留下时间在家琢磨包袱。像《挠挠》《写信》《查卫生》《考学》等很多单口相声,都是经过一年甚至两年、三年才打磨出来的。

那时我跟爷爷同住一室,我在里屋写作业,他在外面闭着眼睛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我走过去喊一声:“爷爷!”他用手揉了揉眼睛,说:“背词儿了,《十点钟开始》里面的那个贯口。这些段子你不演,但不许你不会。”还有很多他曾经说过的段子,像《似曾相识的人》《开粥厂》《卖挂票》,他几乎每天都在重温,每天都在脑子里给观众“演出”。不仅如此,他还经常把台词一字不落地写下来,就连该在哪里停顿、哪里咳嗽、哪里重复,他都标记出来。

有一次我跟爷爷看电视。电视里有两个演员表演相声,逗逗演员上来第一句就是,“相声讲究说学逗唱”。爷爷让我把电视关上。我还纳闷儿,怎么不听了?爷爷说:“人家问他了吗?这话听着就不符合逻辑,这是教科书式的表演。”我听完爷爷的话恍然大悟,突然觉得这相声里的门道真是太深、太细致了。

爷爷年轻时在万全小学、汇文中学一直成绩不错,他的理想是做个读书人,但由于家境原因,被迫辍学改说了相声。他并不埋怨,既然干了这行,就好好干。从跟哥哥马桂元学艺起,给自己立下了“四非”的人生格言:“非学不可、非会不可、非行不可、非好不可。”一辈子都在恪守这句话。

张威 复原老建筑的历史痕迹

张威,1970年出生,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。

近年来,我们工作室参与了天津文庙、李纯祠堂、庆王府旧址、原浙江兴业银行大楼等百余处津城文物建筑的修复设计。我认为,一座文物古迹有可能保存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,修复文物建筑必须在改变原状的前提下,尽可能遵循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可逆性、可识别性和最小干预等原则,不能大拆大建,又必须确保老建筑修缮后安全适用。

修复安里甘教堂时,我们经过严谨考证、判断,认为主堂屋顶瓦的形式应与钟楼一致,于是提出采用陶红色牛舌瓦。后来,在二次挖掘地面时,恰巧发现了红色残瓦,证实了我们的判断。恒隆广场的原浙江兴业银行大楼,如今改造为里巴克旗舰店,楼道里的墙面和展架上了一挂了很多展板,展示历史照片,顾客喝咖啡时也浏览了一个小展览。花园路久大精盐公司旧址建筑的业主也同意把侧门打开,让游客进入一楼展室,了解以“永久黄”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工历史。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建筑对外开放,天津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味道。

李亮节 用天津话写歌,用天津话唱

李亮节,“70后”,首创“天津摇滚曲艺”。

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,开始弹琴,上吉他班。后来认识了不少喜欢音乐的朋友,组了一支乐队。2010年,我的好朋友、相声演员许建德三弦的吴斌介绍给我,录了一首歌——《做个有钱人》。有了三弦,乐队的演出比以前好看了。吴斌去名流茶馆说相声以后,我突发奇想,自己买了把三弦。装上拾音器、背带,按吉他的把位定音,穿上大褂,背着三弦去演出。我为相声广播写了台歌《说学逗唱》,电台总放,认可我的人慢慢多了起来。

机缘巧合,我拜相声名家刘俊杰先生门下。师父给我讲了很多东西,都是书上查不到、在别的地方听不到的。怎么用天津话写歌,用天津话唱?我有一首《眼都青年》就是用天津话唱的。《那年初二》借用了一点点天津时调。有时我想,像我这样唱下去,会不会有一天唱出个“天津大鼓”来?我要为天津写100首歌,把与天津有关的内容做好,把天津传统的、时髦的都吃透,对我的创作来说就足够了。

最近我刚制作了一张新歌专辑,名字叫《似曾相识的人们》。一共18首歌,分上下两集,全部是从传统相声里汲取的素材。相声也是曲艺的形式,所以这张专辑仍是摇滚大鼓。上架马上就要发行,下集明年推出。这两张专辑出版以后,为天津写100首歌的心愿就完成了。最近正在制作中的还有一首《天津民谣》,今年12月31日鼓楼跨年时,我要唱这首歌。

刘春慧 爱说相声,也爱做公益

刘春慧,1965年出生,春晖文艺志愿者团队发起人。

1996年,天津市举办业余曲艺大赛,通过老师介绍,请于宝林先生给我排练。到了1998年夏天,于先生跟我说,好多老观众看见他都问他怎么不演出了?他自己也想演,找到南市的燕乐剧场跟人家谈,每周二、四下午在那儿演出。于先生召集了七个人,我是其中一个,连报幕,都说相声。

园子里的演出上了轨道,基本生活也能维持,我就想,我该回报社会了。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——每年都要捐助困难学生,同时至少做十场公益演出。我的搭档庞军老师也特别支持我,他跟我说:“春慧,只要你去义演,去做公益,无论去哪儿,我跟随着!”我和庞军老师组建了“春晖文艺志愿者团队”,长期做公益活动,做了二十几年。这件事影响了我周围的人,包括我的画家朋友们,他们跟我说:“只要是做好事、做公益,你怎么安排,我们就怎么做。”我带动他们做公益、做慈善,他们的行动反过来给了我更多的感动。

本报记者 何玉新 采访、整理